

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

DONGYASHI YUYUQIANSUITANGSHI

# 东亚视域 遣隋唐使

王勇 /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

# 东亚视域与遣隋唐使

王勇/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东亚视域与遣隋唐使/王勇主编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  
2010.6

ISBN 978-7-5112-0743-2

I. ①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日关系—文化交流—唐代—国际学术会议—文集  
IV. ①K242.03-53②K313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3938 号

**东亚视域与遣隋唐使**

---

**作 者:** 王 勇 主 编

---

**责任编辑:** 刘 彬

**封面设计:** 中联华文

**责任校对:** 贾文梅

**责任印制:** 胡 骑 宋云鹏

---

**出版发行:** 光明日报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100062

**电 话:** 010-67078241

**网 址:** <http://book.gmw.cn>

**E - mail:** [gmcbs@gmw.cn](mailto:gmcbs@gmw.cn)

**法律顾问:**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

---

**印 刷:**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**装 订:**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**开 本:** 1/16

**总字数:** 288 千字

**总印张:** 16

**版 次:**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**印 次:**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** ISBN 978-7-5112-0743-2

---

**定 价:** 32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 序章 隋文帝与遣隋使

王 勇（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）

## 引 言

有关遣隋使的研究，较之热火朝天的遣唐使，显得过于低调乃至冷落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资料匮乏使然，另一方面由研究者的轻视态度所造成。研究“倭五王”与南朝交通者，视野多不及遣隋使；以遣唐使为专题的学者，最多将遣隋使一笔带过。

由于这些原因，遣隋使虽然在“倭五王”与遣唐使之间，扮演日本外交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，但连一些最基础的问题——譬如遣使次数、渡海路径、赴华使命等等，均未受到应有的关注，以致论者往往语焉不详。

本文聚焦于隋文帝治世（581～604），通过对开皇二十年（660）和仁寿四年（604）两次遣隋使相关史料的梳理辨析，提出遣隋使次数最多可达7次的说法，同时论述6～7世纪之交东亚各国外交的互动。

## 一、遣隋使的派遣次数

关于倭国究竟派出过几次遣隋使，学术界尚存争议，中日学者也有分歧。如木宫泰彦<sup>①</sup>认为只有3次，森克己<sup>②</sup>和张声振<sup>③</sup>说是4次，此外还有5次、6

---

① 木宫泰彦著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（胡锡年译），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4月，49～52页

② 森克己著《遣唐使》，[日]至文堂，1990年8月，9～10页

③ 张声振著《中日关系史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4月，70页。

次的说法。<sup>①</sup>中日文献记载的齟齬、学者取舍角度之不同，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。为了便于下面分析讨论，兹摘录中日文献相关记录。

(1) 第一次(600年)。《隋书·倭国传》云：“开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北孤，号阿辈鸡弥，遣使诣阙。”

(2) 第二次(607年)。《日本书纪》云：“(推古十五年七月)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，以鞍作福利为通事。”又《隋书·倭国传》载：“大业三年，其王多利思北孤，遣使朝贡。”

(3) 第三次(608年)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云：“(大业四年三月)百济、倭、赤土、迦逻舍国，并遣使贡方物。”

(4) 第四次(608年)。《日本书纪》云：“(推古十六年九月)唐客裴世清罢归。则复以小野妹子臣为大使，吉士雄成为小使，福利为通事，副于唐客而遣之。”

(5) 第五次(610年)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云：“(大业六年正月)倭国遣使贡方物。”

(6) 第六次(614年)。《日本书纪》云：“(推古二十二年六月)遣犬上君御田锹、矢田部造(阙名)于大唐。”

由此可知，中国文献记载遣使4次(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五次)，日本文献记载3次(第二次、第四次、第六次)，除了第二次互见外，两者合计遣使6次。(表1)

表1 遣隋使一览表

|     | 西历  | 中国年号 | 日本年号 | 中国文献     | 日本文献   |
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次 | 600 | 开皇二十 | 推古八  | 《隋书·倭国传》 |        |
| 第二次 | 607 | 大业三  | 推古十五 | 《隋书·倭国传》 | 《日本书纪》 |
| 第三次 | 608 | 大业四  | 推古十六 | 《隋书·炀帝纪》 |        |
| 第四次 | 608 | 大业四  | 推古十六 |          | 《日本书纪》 |
| 第五次 | 610 | 大业六  | 推古十八 | 《隋书·炀帝纪》 |        |
| 第六次 | 614 | 大业十  | 推古二二 |          | 《日本书纪》 |

<sup>①</sup> 拙著《日本文化——模仿与创新的轨迹》(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0年)取“6次说”,近年上田雄在《遣唐使全航海》([日]草思社,2006年12月)中仍采“4次说”。



如果拘泥于中国文献记载，遣隋使仅有4次<sup>①</sup>；倘若仅取信于日本文献，遣隋使只有3次。千余年前日本派遣的使者，能够见诸一方文献，已属幸运；互见于双方正史，堪称偶然。这种情况即使从遣唐使的事例判断，其概率也不是很高。<sup>②</sup>除此之外，唯以史书为信的传统思路，也是值得商榷的。翻检所谓“正史”以外的文献，还能发掘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遣隋使相关记录。

如大业六年（610）遣隋使，《隋书·炀帝纪》作“正月己丑，倭国遣使贡方物”，而《册府元龟·朝贡三》则作“三月”，当记同一批遣隋使的不同活动，不能因为《日本书纪》失载而否定之。

## 二、开皇二十年遣隋使

开皇二十年（600）的遣隋使，由于《日本书纪》失载，日本学术界多存疑义，或推测是九州豪族私遣之使，或怀疑是607年遣使的重复误载。<sup>③</sup>然而，有关这次遣隋使，除了《隋书·倭国传》外，《杜佑通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宋史》等中国文献均有明确记载，甚至日本文献如《释日本纪》也有提及，绝不是唯有一例孤证。为了便于比对稽考，兹将《隋书·倭国传》中“开皇二十年”与“大业三年”两次遣使记事摘录如下：

开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北孤，号阿辈鸡弥，遣使诣阙。上令所司访其风俗。使者言：“倭王以天为兄、以日为弟，天未明时出听政，跣趺坐；日出便停理务，云委我弟。”高祖曰：“此太无义理。”于是训令改之。……新罗、百济皆以倭为大国，多珍物，并敬仰之，恒通使往来。

大业三年，其王多利思北孤，遣使朝贡。使者曰：“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，故遣朝拜，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。”其国书曰：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。”帝览之不悦，谓鸿胪卿曰：“蛮夷书有无礼，勿复以闻。”

① 据《隋书·倭国传》“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”，裴世清回国时（《日本书纪》记载为推古十六年九月），遣隋使相随而来，则中国文献有5次遣隋使记录。

② 日本正史（六国史）记载实际成行的遣唐使为16次，但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（日本传、倭国传）仅记载12次，其中2次不见于日本正史，双方重合者只有10次。

③ 江户时代本居宣长在《驭戎慨言》中提出“西边之人所为”说，此“西边”指九州一带；木宫泰彦《日华文化交流史》（〔日〕富山房，1965）认为是日本派驻朝鲜半岛镇将所为。

对照两次遣使记事，我们可以获得诸多信息。首先，因版本的不同，倭王“多利思北孤”或标记为“多利思比孤”<sup>①</sup>，“比”与“北”字形相近，两批使节的派遣者无疑为同一位倭王，不存在地方豪族使节与中央政府使节之别；其次，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面谒“高祖”文帝，大业三年的遣隋使朝见“世祖”炀帝，文帝在位至仁寿四年（604）七月，正史不至于杜撰帝号和年号；还有，文帝“令所司访其风俗”，而炀帝时没有这节内容，这也佐证开皇二十年倭使初来乍到；最后，开皇年间的遣隋使未携带国书，而大业年间遣隋使携带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”的国书，这个重要情节史官不会张冠李戴。

此外，在《隋书·倭国传》中，开皇二十年遣隋使的记事，紧接“自魏至于齐、梁，代与中国相通”展开，与“倭五王”以来约百年<sup>②</sup>后重启中日通交的史实相符；而且，该记事篇幅大、细节多，内容与大业三年基本不重复，不似史官捏造或虚构出来的。因此，认定开皇二十年遣隋使乃“大业三年遣使重复误载”之说，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。

尽管如此，对此次遣使存疑者或许还会继续问：“600年的遣隋使是在何种国内外情势下引发的？”也就是说，遣使的国际背景是什么？日本方面的动机何在？尊经阁文库所藏的《异国牒状记》，也许会为我们揭开疑窦提供一些线索。

该文献罗列历代外国送达的“牒状”（此指国书或公文），追溯日本朝廷回应之惯例，检讨得失，以为龟鉴。在“历代异国合乎礼仪牒状”项下，共列出16件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“牒状”，时间跨度从5世纪初到13世纪末。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，对排序第二的隋朝国书有如下记录：

推古天皇二年正月，隋国之牒状到来，其文曰“皇帝问和王”。圣德太子御览此状，怨其不书“天子”而写“和王”，故不赏其使。

日本推古天皇二年，当隋文帝开皇十四年（594）。此年隋朝国书送达倭

① 开皇二十年条倭王“多利思北孤”，此据百衲本，《册府元龟》亦同。但《北史·倭国传》、《通典》卷一八五、《资治通鉴》大业四年条、和刻本《隋书》、中华书局校注本《隋书》等“北”均作“比”。

② 一般认为“倭五王”最后一次遣使，是《宋书·顺帝纪》升明二年（478）五月记事，但《南齐书·倭国传》建元元年（479）五月条、《梁书·倭传》天监元年（502）四月条，亦有封号倭王的记录，倭国是否遣使求封，有待稽考。

国，未见他书记载，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？我们围绕《隋书·东夷传》所记6国（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靺鞨、流求、倭），先从国际情势加以考察。

隋朝于581年开国，改元为“开皇”，高句丽、百济、靺鞨相继朝贡，其中高句丽为“岁贡”；开皇九年（589），隋灭陈而一统江山，百济王余昌奉表庆贺，此后随着与高句丽关系紧张，开始频繁向隋朝贡。

百济自开皇初朝贡以来，似乎中断了数年，平陈之年（589）“有一战船漂至海东聘牟罗国，其船得还，经于百济，昌资送之甚厚，并遣使奉表贺平陈”（《隋书·百济传》）。这是一次两国恢复通交的偶发事件，但在东亚外交史上产生巨大影响。《隋书·百济传》云“其人杂有新罗、高丽、倭等”，或许通过百济的朝贡，文帝的眼光投向了新罗乃至倭国，极有可能遣使两国，宣喻正朔。

在上述背景下，在开皇十四年（594）同一个时间节点，新罗“遣使贡方物”（《隋书·新罗传》），倭国收到“隋国之牒状”，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。回头再看《隋书·倭国传》开皇二十年朝贡记事的末尾“新罗、百济皆以倭为大国，多珍物，并敬仰之，恒通使往来”，看似有些唐突，其实佐证新罗、百济、倭自成一个交流圈，随着百济率先进入隋帝国朝贡圈，新罗、倭国也随之做出联动反应。这便是开皇二十年（600）倭国派出遣隋使的国际背景。

再看日本国内情势。推古天皇元年（593）四月十日，圣德太子“仍录摄政，以万机悉委”（《日本书纪》），开始一系列内政外交改革。推古二年（594）二月，天皇发布“兴隆三宝”诏，此后日本史籍频载百济、新罗朝贡记事。在与朝鲜半岛诸国交往中，圣德太子也许已经注意到隋帝国的崛起，倘若推古二年（594）收到隋朝“牒状”，必定会做出积极反应，而开皇二十年（600）的遣隋使，就是积极反应的一个结果。

《隋书·倭国传》关于开皇二十年遣隋使的长篇记事，尚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，比如末尾部分“新罗、百济皆以倭为大国，多珍物，并敬仰之，恒通使往来”，察其语气措辞，不似出自新罗、百济之口，应该是倭国使传递的信息，这也可以看成开皇二十年遣隋使存在的旁证。

### 三、仁寿四年遣隋使

开皇二十年（600）的遣隋使备受质疑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使者姓名不见史载，而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奉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先驱，依据是



《日本书纪》推古十五年七月三日条：“大抵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，以鞍作福利为通事。”

日本推古十五年，当隋大业三年（607）。查《隋书·倭国传》，确有对应的记录：“大业三年，其王多利思北孤，遣使朝贡。”殊不知，《隋书》所录4次遣隋使，无一明记使者姓名，仅因使者阙名而辄疑之，实非学者所取。

开皇年间倭国使者阙名，大业年间小野妹子名垂青史，确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常识。然而，日本镰仓时代末期，卜部兼方为注释《日本书纪》而撰写的《释日本纪》<sup>①</sup>（卷一开题），引用《延喜讲记》的一段史料，令人对所谓的“常识”产生怀疑：

问：大唐谓此国为倭。而今谓日本者，是唐朝所名欤？将我国自称欤？

答：《延喜讲记》曰：自唐所号也。隋文帝开皇中，入唐使小野妹子，改倭号为日本。然而依隋皇暗物理，遂不许。

所谓《延喜讲记》，指延喜年间（901～923）史官向天皇讲解《日本书纪》的记录。这则史料中最令人惊异之处是，指出小野妹子遣使一事发生在“隋文帝开皇中”。那么，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，是否就是小野妹子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文献（除《隋书》）关于“开皇”年间遣隋使是如何记载的。

（1）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六六《外臣部·继袭一》：“倭国……隋开皇二十年，其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比孤，号阿辈鸡弥，遣使朝贡。”

（2）《杜佑通典》卷一八五《边防一·倭》：“倭自后汉通焉。……隋文帝开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名自多利思比孤，其国号阿辈鸡弥，华言天儿也，遣使诣阙。”

（3）《新唐书》卷二十《日本传》：“日本，古倭奴也。……其王姓阿每氏……更以天皇为号。……次用明，亦曰多利思比孤。直隋开皇末，始与中国通。”

（4）《宋史》卷四九一《日本国传》：“雍熙元年，日本国僧裔然……献铜器十余事并《本国职员令》、《王年代纪》各一卷。……其《年代纪》所记云：‘初主号天御中主……次用明天皇，有子曰圣德太子……当此土隋开皇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释日本纪》28卷，卜部兼方编撰，成书于1274～1301年间，应用大量文献注释《日本书纪》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中，遣使泛海至中国，求《法华经》。……凡六十四世。’……按隋开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名自多利思比孤，遣使致书。”

如上所列，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杜佑通典》均明确记载“开皇二十年”，《新唐书》作“开皇末”，与前两者稍有不同。按《新唐书·日本传》关于天皇谱系的记载，学界公认取材于雍熙元年（984）入宋的日本僧裔然所提供的《王年代纪》，欧阳修、宋祁等在编撰《新唐书》时，虽然能看到《王年代纪》原本，但囿于编撰前代史书，只采录了唐以前资料而已。相比之下，元代成书的《宋史》，则忠实地抄录了原文。兹摘录相关部分如下：

次用明天皇，有子曰圣德太子，年三岁，闻十人语，同时解之，七岁悟佛法于菩提寺，讲《圣鬘经》，天雨曼陀罗华。当此土隋开皇中，遣使泛海至中国，求《法华经》。

上述记载比《新唐书》多出讲《圣鬘经》、求《法华经》等情节，这显然是入宋僧裔然带来的新信息，所以《宋史》编者脱脱根据《隋书》等前史记载，特意在文后加上一条按语：“隋开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名自多利思比孤，遣使致书。”

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大胆的问题：开皇年间的遣隋使，除了开皇二十年那次，是否还有另外一次？因为我们注意到，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没有求书情节，也不出现圣德太子、小野妹子等人物。然而，据裔然传来的《王年代纪》，圣德太子遣使求《法华经》；据《释日本纪》所引《延喜讲记》，小野妹子曾于“隋文帝开皇中”遣使入华。

如果假设小野妹子曾于开皇年间遣使入隋，那么不是开皇二十年（600），就是在此之前。因为次年（601）正月改元“仁寿”。然而，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，开皇二十年“始与中国通”，《隋书·倭国传》的记事也显示倭国初次朝贡。剩下的可能性，如果限于隋文帝治世，只有仁寿年间（601~604）了。

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，因为伴随小野妹子求书情节的遣隋使信息，得自日本人宋僧裔然，而日本文献记载中国王朝、年号，屡屡出现混淆。如《释日本纪》一边说小野妹子于“隋文帝开皇中”觐见“隋皇”，一边却称他为“入唐使”；《日本书纪》情况依然，凡涉及遣隋使活动，均以“唐”代指“隋”。

我们假设小野妹子在文帝治世曾经遣使入隋，暂且不拘泥于“开皇”年

号，那么遣使发生在文帝治世的仁寿年间有无可能呢？平安时代成书的《经籍后传记》<sup>①</sup> 逸文中，有如下一段记载，可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：

以小治田朝（今按推古天皇）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，始用历日。是时，国家书籍未多，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，买求书籍，兼聘隋天子。<sup>②</sup>

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，当隋文帝仁寿四年（604）。有关此次遣隋使，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。但是此次遣使与“始用历日”——遵奉正朔相呼应，是日本跨入东亚国际舞台的标志性一步。与其说日本在使用中国历法之后才派遣使者入隋，毋宁说日本为了派出遣隋使而特意“始用历日”，以向世界宣示本国文教兴盛。<sup>③</sup> 使者“小野臣因高”即小野妹子，入隋后取名“苏因高”。

根据上述推演，开皇十四年（594）隋朝向日本送国书颁示正朔，引发开皇二十年（600）以后一系列的遣隋使渡海；第一次遣隋使（600）带回大量信息，于是就有了推古十二年（604）“始用历日”、遣使求书的举动。<sup>④</sup>

仁寿四年（推古十二，604）遣隋使，究竟是否真正存在，由于史料极度匮乏，尚不能妄断。如果此次遣隋使得到印证，则小野妹子活跃于文帝与炀帝两代的外交舞台，他在仁寿年间的文化活动与大业年间的政治活动，也必然具有内在关联。

## 结 语

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仁寿四年，中国处于皇位交替的非常时期。当年七月，隋文帝去世。史官赞曰：“《职方》所载，并入疆理；《禹贡》所图，咸受正朔。”在文帝治世时，构建了宏伟的东亚帝国，其影响辐射至周边各国。

---

① 《政事要略》卷二十五引用作“儒传”。惟宗允亮编撰《政事要略》完成于长安四年（1002），则《儒传》（《经籍后传记》）成书当在此前。

② 田中健夫《善邻国宝记·新订续善邻国宝记》，[日]集英社，1995年。

③ 关于此次遣隋使，也有人怀疑指607年的遣隋使，使者均为小野妹子。但“是时”紧接“始用历日”，应该指“（推古）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”，即604年正月一日，遣使不会距此太久。

④ 《善邻国宝记》编者瑞溪周凤，在引用《经籍后传记》后，特加考注云：“又《推古记》、《太子传》所记妹子入隋，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。然《书籍后传记》曰十二年甲子……孰是？当以《推古记》、《太子传》为是欤。”对推古十二年（604）遣隋使存疑。

据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：“始开皇初定令，置《七部乐》。一曰《国伎》，二曰《清商伎》，三曰《高丽伎》，四曰《天竺伎》，五曰《安国伎》，六曰《龟兹伎》，七曰《文康伎》。又杂有疏勒、扶南、康国、百济、突厥、新罗、倭国等伎。”从“倭国伎”进入隋朝宫廷，也可推知倭国被纳入朝贡圈之内。

考察隋文帝时期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，百济、新罗、倭国的互动尤其引人注目。三国在明争暗斗中，各自展开对隋外交。虽然百济最先朝贡隋朝，新罗继之，倭国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《隋书·倭国传》开皇二十年记事，最后特殊一笔三国的关系，可为明证。

仁寿四年（604）七月文帝去世后，其子隋炀帝旋即登基继位，这位历史上颇多争议的帝王，在外交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，东亚格局又将为之一变，中日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章 隋文帝与遣隋使 .....       | 1     |
| 甲编 纪念讲演 .....          | 1     |
| 现代遣唐使与东亚交流 .....       | / 3   |
| 遣外使节与文明载体 .....        | / 8   |
| 新罗遣唐使的历史作用 .....       | / 13  |
| 从遣唐船到唐商船 .....         | / 20  |
| 乙编 文学艺术 .....          | 25    |
| 诗的两面与歌的一面 .....        | / 27  |
| 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的述怀诗 .....    | / 38  |
| 菅原道真和停派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 ..... | / 49  |
| 古代日本汉诗的发轫 .....        | / 54  |
| 丙编 制度文化 .....          | 63    |
| 遣唐留学生与日本文化的形成 .....    | / 65  |
| 隋唐都城接待外使机构及设施 .....    | / 74  |
| 唐代宫人的相关考察 .....        | / 92  |
| 丁编 书籍文物 .....          | 109   |
| 奈良寺院摄取汉文典籍小考 .....     | / 11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空海《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》中“心”的思想 | / 127      |
| 圆仁巡礼饮食考              | / 135      |
| 东亚唐镜的存在形态及其意义        | / 148      |
| <b>戊编 遣唐使像 .....</b> | <b>161</b> |
| 遣唐使停止后日本的对外意识        | / 163      |
| 遣唐使形象的渐变             | / 175      |
| 追寻入唐僧足迹的寂照           | / 183      |
| <b>己编 综合研究 .....</b> | <b>187</b> |
| 8~11 世纪日本的南方国境问题     | / 189      |
| 遣隋使备忘录               | / 200      |
| 法进被派往福州之谜            | / 215      |
| 从入唐僧惠萼看东亚交流史         | / 232      |
| <b>后 记 .....</b>     | <b>241</b> |



# 甲编 纪念讲演

---



# 现代遣唐使与东亚交流

阿南惟茂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中交流中心所长）

## 序 言

今天，能在“遣隋使·遣唐使 1400 周年—东亚文化交流的源流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机会作纪念讲演，我深感荣幸。正如在方才的开幕式上各位来宾所说的，在遣隋使派遣 1400 周年之际，对东亚地区，主要是中、日、韩三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回顾，学习本研究领域众多前辈学人的学术精神，确是恰逢其时。同时，相信这对生于当代的我们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。

首先，在此谨向本次研讨会的发起人王勇教授，以及尽心竭力筹备本次会议的浙江工商大学的各位老师，表达我衷心的敬意与感谢。

说实在话，本人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知识极为有限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王勇教授的著作以及本人与他的多次交谈。王勇教授也很清楚这一点。因此我推测，委托我以“现代遣唐使”为题谈谈出任大使的相关经历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

## 一、遣唐使的历史回顾

本人任大使期间，很少有时间对中日交流的历史进行回顾研究，自去年（2006）5 月从外务省退休，才逐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学习。

在遣唐使时代，就有阿倍仲麻吕、最澄、空海、圆仁等以及鉴真和尚等充满着冒险和浪漫色彩、富有趣味的故事。就我个人初步的感想而言，在当时日本的对外关系中，中国所占的压倒性比例自不必赘述；同样，尽管在政治、外交、经济以及文化各个领域朝鲜半岛的意义也非常重大，但给我的印象是，此前的历史研究对朝鲜半岛的连结作用，特别是对文化层面上深入而强有力的联